

看世界

是「印度」还是「巴拉特」

施普皓

实际上,从古至今,印度的国名已经变化了很多次。印度一词来自梵语中对印度河的称呼——Sindhu,用以指代印度河及其流域的大片土地。这个词在我国唐朝时被译为“身毒”,也可译作人们更加熟悉的“天竺”。此后千年的时光里,不同族群来到这片土地上,并先后演化出了Sindhu一词的不同变体。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对印度一词的认知也逐渐分化。

约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来到此地。由于波斯人的发音习惯,很多人很难发出S音,于是就将Sindhu变为了Hindu,进而衍生出Hind和Hindu-istan这两个词语,后者意为“Hindu的地方”,流传至今,印度最大的媒体之一《印度斯坦时报》用的便是这个词。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而后向印度进发,印度也是从这时开始为西方所知晓。后来,Sindhu一词又为适应希腊语发音习惯,先后变成了Indu和Indo,这也是英语中India一词的词源。

India这个单词在很多印度人看来是个“舶来品”的原因就在于此。尤其是步入近现代,印度的各类名称被国内不同群体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和宗教色彩,其背后的象征意义越发重要,印度国名之争愈演愈烈。

那么,“巴拉特”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还有个大家更熟悉的翻译——“婆罗多”。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有一位国王,名字就叫婆罗多。他的婆罗多在印度家喻户晓。细细考证一番,“婆罗多”这个名字最早能追溯到吠陀(意为知识,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献材料和文体形式,主要文体是赞美诗、祈祷文和咒语)经典——印度最古老的诗歌集之一《梨俱吠陀》。在《梨俱吠陀》中,婆罗多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古老部落。另有史学家考证,婆罗多最早可能是恒河流域西部一个原始部落的名字。

鉴于以上种种,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婆罗多”,也就是“巴拉特”,显然比“印度”更适合作为国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从古代神话史诗文献中追溯“印度正统”,更愿意将“巴拉特”定义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印度古称。因此,在他们眼中,国家改名“巴拉特”具有恢复古印度辉煌的重要意义。

当然,有人赞成,自然也有人质疑。

一些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古代典籍文献中所提到的“巴拉特”更接近“特定社会秩序的文化空间”,而不是“明确的地理空间”。历史学者给出的依据是,直至19世纪中后期,东方主义学者和殖民教育体系的传播巩固,加上印度教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建构,才逐渐促使“巴拉特”与印度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尽管“巴拉特”的称呼看上去比“印度”更加具有“古印度特色”,但实际上这种特色的“历史”并不长。

最近一段时间,印度更改国名的事情可谓沸沸扬扬。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印度方出席时使用的是“巴拉特”(Bharat)名牌而非“印度”(India)名牌,而印度政府发布莫迪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峰会的公报中,也将其称为“巴拉特”总理而非“印度”总理。

印媒也没闲着,争相报道莫迪政府在18日开幕的印度议会特别会议上正式提出更改国名的决议,并且表示,“更改国名是莫迪政府一直努力推动的改革,有很强的政策连贯性,是莫迪政府推行去殖民化和印度教化主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社论文章指出,印度更改国名的议程,彰显出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进一步加强巩固。

“巴拉特”究竟是什么?莫迪政府为什么执着于把“印度”这个国名改成“巴拉特”呢?

若论“资历”,那还是“印度”这一名字走过了更长的岁月。

与此同时,更多人则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对更改国名不敢苟同。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央地矛盾、民族矛盾由来已久,这就使得印度国内的直接民主一直都步履维艰。印度国内就有学者明确表示,上述难以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印度这个国家存在分裂的风险,如果在宗教、历史、意识形态上再度加深分化,分裂的风险会继续上升。

同时,莫迪政府之所以提出将“印度”改作“巴拉特”,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淡化甚至抹除印度被殖民的历史。然而,无论过去多么不堪回首,殖民化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值得铭记、值得反思,值得人们从中学习如何激浊扬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一切屈辱的过去都彻底否定,既无必要也做不到。

多年以来,莫迪和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一直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立身之本,所推行的很多政策也都和加强民众的民族认同感相关,此次提议更改国名只是其中之一。

早在今年3月6日,印度最高法院就接到了一份来自印度人民党高层的请愿书,希望对印度所有城市和名胜重新命名。请愿书认为,现用名大多来自几个世纪前“野蛮的外国侵略者”。最终,印度最高法院以该请愿书违宪为由将其驳回,并且表示,这么做只会激化国内各方矛盾,让已经世俗化的印度变得不再和谐。也就是说,印度人民党早就对“改名”一事跃跃欲试,只不过最近这一次直接策划了一出大戏。

实际上,莫迪和印度人民党也面临着抉择。在世俗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印度,

执政党该如何推行自己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凝聚国内民众的向心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凝聚民心事关国运,从这一点来看,莫迪政府的大方向是



图为印度德里红堡。
(中经视觉)

闻香识希腊

刘之语



及其追随者的象征物之一。目前,茴香籽被大量用于成品酒制作。

比如,薄荷。薄荷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intithi(曼西)。传说中,曼西本是冥界女神,因美貌被冥王哈迪斯看中,引起了冥后珀耳塞福涅的嫉妒。为使冥王忘记曼西,珀耳塞福涅将其变成了只能开出小花的“弱小的植物”,哈迪斯随后赋予其能散发芬芳香气的力量。因此,古希腊人认为薄荷是能与冥界相通的草药,可以净化灵魂,常在葬礼中使用。古希腊人还喜欢用薄荷搓手,认为薄荷的气味象征着权力、爱、激情、奉献和美德。

再比如,百里香。自荷马时代(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以来,百里香一直被认为是勇气和力量的象征。百里香产量丰富,价格便宜,即便是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也能享受到百里香和蜂蜜的混合产品。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冥王星》中,一位奴隶说,“我和我的主人吃同样的百里香”,足见当时百里香的普及程度。在中世纪,百里香被当作治疗抑郁和癫痫的药品,人们心情不好时,会在床下或枕头上塞上一些用以缓解情绪。

还比如,香桃木。香桃木是爱神阿芙洛狄忒的圣木。在神话中,女神从爱琴海的泡沫中诞生,而后来上岸,躲在香桃木背后。因此,香桃木也是美丽与青春的象征。直到今天,很多国家的新娘还会在婚礼上佩戴香桃木花叶编织的花环。

除了香料与香草,希腊人还尤其喜爱香水与香油。他们认为,使用类似的芳香物质可以保持健康、养护精神、彰显地位。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提到,香水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从出生、结婚到死亡,几乎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的重要仪式都需要使用香水和香油。婚礼前,人们会用鲜花和香草,如百合、鸢尾、杜鹃花、香桃木、水仙花等沐浴;有尊贵的客人前来做客时,房主会用专门保存的香油给客人洗脚以示尊敬;古希腊人还相信,用熏过香的布料包裹尸体,可以令逝者在来世获得幸福。

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曾撰写过一本名为《关于气味的书》,深入探讨了古希腊香水的

使用。泰奥弗拉斯托斯还区分了香水的“好坏”,并指出,由百合制成的清淡型香水更适合男士,最适合女士的是甜马郁兰、没药和胡椒。亚历山大大帝在希腊香水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大规模东征,印度及中东地区的香料,如檀香、肉豆蔻、安息香等大量香料被引入希腊,还由此引发了新一轮“香水浪潮”。

史料认为,最先制造出液体香水的是古希腊人。不过,这种香水与如今使用的香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当时的通用做法是将花瓣放入作为“底料”的油中煮沸,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用新鲜的橄榄油。之后,将这些香油放入专门制造、不同规格的容器中储存,再在表面上绘制图案作为装饰。

有趣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对香水瓶作了功能上的细分。比较有名的器型包括:细颈球状瓶,这种器型容量较小、便于携带,可以用带子系在人的手腕上,或挂在墙上;雪花石膏瓶,细颈长瓶,通常没有把手,难以随身携带,主要置于房间内;细颈有柄装饰瓶,此种器型形制众多,分为红底及白底两种,由于瓶身较大,古希腊的创作者经常会在瓶身上绘制神话或战争题材的画作,因而极具考古及历史意义。

除了在神话体系与香水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希腊人在烹饪技法中也时常用到各种芳香制品。直到今天,如果你走进希腊家庭的厨房,仍会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一些不知名名字的调料,或被研磨成粉末状、颗粒状,或依旧保持着枝叶的原始样子。这是因为,希腊属于地中海饮食体系,自古遵循素食简餐之道,饮食原料比较简单,而且通常采用煮或烤等相对简单的烹饪手法。为把简单的食材做出丰富的味道,希腊人常常将香料混搭起来进行调味。牛至是希腊人最喜欢的调味料之一,其味道微辣,可以加在烤肉、沙拉以及奶酪上;肉桂气味芬芳,常被添加于咖啡及甜点之中;迷迭香的嫩枝和叶子气味辛辣,多用在鱼类、内脏类烹饪及炖菜中。这也使得,在希腊的各大旅游区,琳琅满目的调味品都是游客购买伴手礼的首选。

作为希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度参与者”,香料几乎串联起希腊的过去与现在,其发展与演变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

闻香识希腊,诚不我欺。

图为希腊圣托里尼岛。
(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韩叙 美编 夏祎 来稿邮箱 gjb@jirbs.cn